



肃贪局调查电动方程式车赛

■ 本报评论员:余凡

今年8月下旬,雅加达省议会(DPRD)的斗争民主党(PDIP)及印尼团结党(PSI)省议员,计划针对雅京省长推动的电动方程式车(Formula-E)赛事行使质询动议(interpelasi),但省长成功获得“七党集团”的支持。从此,“电动车赛事”成了全国民众热门的话题。

《罗盘报》(KOMPAS.com)于11月4日报道,雅加达2022年的电动车赛事如今面对肃贪局(KPK)要求澄清的法律程序。肃贪局发言人阿里(Ali Fikri)向媒体表明:“是的,肃贪局正在向几个有关方面听取说明及询问,并为调查小组蒐集所需要的资料及情报信息。”但是,肃贪局不能向公众透露有关该案件的进

一步调查方向,以及已掌握的相关资料。

雅加达副省长利扎(Ahmad Riza Patria)证实,雅加达青年及体育厅长(Kadispora)阿末(Ahmad Firdaus)因电动车赛事被肃贪局邀谈。该厅是负责付还2019及2020年电动车赛事保证金(commitment fee)的相关部门,已交付给电动车赛执行委员(FEO)高达5600亿印尼盾。他说:“我们当然遵守国家的所有法律,无论是肃贪局、警察局、检察院或法院的正式传召,我们将依法给予尊重并执行。”“我们希望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愿并不妨碍2022年6月电动车赛的如期举办。”并表示在之前的财务审核中没发现什么漏洞。

印尼团结党的省议员昂卡拉(Anggara Wicitra)表

示:“有了肃贪局的调查,我希望不要再有被掩盖的资料及事实。把所有情况公开,让雅加达民众看明白。”他认为有三大疑点:“我们不知道佣金是真的交给英国的赛车委员(FEO),或者是输送到别的方面去。”因为,雅加达省议会至今还不能见证省府付还5600亿盾保证金的银行正式的汇款手续。

其次,财务稽查局(BPK)发现,在电动车赛事可行性报告的盈亏预算中并没有包括保证金这一条。昂卡拉说:“雅京省政府必须将该份可行性报告重新修订。”第三个疑点,“当初省政府说每年需缴付约5000亿盾的佣金,然后变成三年付5600亿盾。这意味着,其实雅加达从一开始很可能就无须付还什么保证

金。”这些当然必须经过审核证明。

《时代网》(TEMPO.CO)于7日报道,肃贪局的调查小组已经就电动车赛事的举报开始传召一些证人,以便了解有关情节及集中资料证据。肃贪局发言人阿里(Ali Fikri)说:“我们希望民众继续跟进肃贪局的工作,作为督促及支持杜绝贪污腐败的主要力量。”

雅京省长阿尼斯(Anies Baswedan)于5日在市政厅参加会议后,被记者问及有关雅加达青年及体育厅长因电动车赛事被肃贪局约谈的情况时,顾左右而言他地说:“足够了,没有别的风声和传言了。”并表示记者们让开路,然后径自走进他的专属办公室内。

省议会(DPRD DKI)议长埃迪(Prasetyo Edi Marsudi)表

态支持肃贪局对电动车赛涉嫌违法腐败的行为进行调查。他说:“作为反贪部门,除了民众举报的疑点,肃贪局也有了初步的证据。”“对于此事,我重申,省政府动用人民的每分钱,必须详细交代。”

印尼CNN网于11月9日报道,已离职的肃贪局前发言人费柏里(Febri Dian-syah)于8日在其个人推特(twitter)上贴文称:“肃贪局长费尔利(Firli Bahuri)表明要查清电动车赛事及核酸检测(PCR)的投诉,这需要时间来证明,究竟他是认真审查,或者只是空口说白话?”他对肃贪局长的质疑,不应源于个人的恩怨。他甚至话里藏针地说:“最重要的是,肃贪局必须具有独立性(independen),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政治干扰的

趋势。能做到吗?我不敢肯定,等到证明后再说吧。”对现任政府的民主性来个“含沙射影”!

之前,肃贪局长在官方网站上留言:“肃贪局绝不松懈对贪腐行为的根除,我们将依法调查并严惩任何贪污者,肃贪局绝对不留情面,并将以专业手段获取足够的证据。”“包括电动车赛事及核酸检测PCR在内的涉嫌贪腐投诉,肃贪局已经开始调查工作。”

数位网红政论员对肃贪局长表示支持,相信他在克服内部困扰的“老问题”后,一定能在电动车赛事的调查中找到症结所在,还雅加达民众一个预算公开、程序公开的赛事;还国家财政一个天清气朗、没有贪污的蓝天。觉醒了印尼民众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 新加坡:曾秀敏

我们常听到许多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学习者感叹:“华文真难学!”这样的怨言,新加坡的学生也深有共鸣。

话到此处,我们不禁开始疑惑:何谓“难”?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语言学习的“难”与“易”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探讨这个问题:一、语言本身;二、学习者的语言背景及学习环境。

本文将以中英对比的方式来分析华文的学习难度。选择用中文、英文进行对比的原因很简单:“难”与“易”是相对的——我们认为华文难学,正是因为我们觉得另一种语言更容易学。从学习者的语言背景来看,外国学习者与新加坡学生之间有着明显的共同点:英语是大家的第二语言。换句话说,英语是大家首先掌握和使用的语言。如此说来,人们普遍的思想就是——“华语比英语难学多了!”但,真相是否如此呢?

从字形来看,有人说中文的书写系统很不合理,因为它“没有按照常识使用字

华文学习的“难”与“易”

母”。其实,这样的比较是荒唐的,因为中文和英文本就属于不同类型的文字。我们又怎么能用另一种语言的书写方式来断定中文的“不合理”呢?英文单词由26个字母组成,是表音文字;而中文却是表意文字,它并不表示字的读音,只表其意。

试问,若非要中文和英文一样,采用字母的方式写文字,那中文不就失去它“表意”的意义了吗?况且,汉字的书写系统其实是更有利于学习的。例如:“火”“口”“木”这些象形字,单看字形的话,我们也能猜出其意。

就是连复杂一点的会意字,其字形也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它。如:“秋”为何有“禾”与“火”?因为秋天收获谷物时,须用火焚烧秸秆,灭除害虫。这样的字形,岂不让人更容易学习汉字呢?

从字音来看,有人批评中文的“音调系统很奇怪”。确实,汉语的声调是很多学习者的绊脚石。“数

学”与“输血”、“过奖”与“果酱”、“老板”与“老伴”、“熊猫”与“胸毛”——中文语调奥妙无穷,学习者却是一窍不通,不过,与其怨天尤人,我们不妨用正向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

正因这有趣的音调系统,我们学会一个读音,不就学会很多种读音与词语了吗?对比英文,每个单词都有独特的意思和读音(有些还像“onomatopoeia”一样复杂)。要学习任何单词,必须从头学起,掌握其自然拼音法。这样一来,学习中文难道不比英文容易一些?

从字义来看,有人觉得无论是现代汉字还是文言文,中文都非常难理解。此外,就连在“字典里查一个字都很复杂”。这些我就要反驳了。如刚才所说,中文是表意文字;我们能直接从字面上理解字、词的意思。例如:“火”——从字形来看,学习者不难发现象形字指的便是火焰。

过后,我们又联想到“火炎焱燚”——“火”上加“火”,无疑就是指火势越

来越猛。这样的字义还不够好理解吗?再说起文言文,它虽确实令人费解,但英语不也有Old English(古英语)、Middle English(中古英语),甚至是Shakespearean English(莎士比亚英语)?

若要再说华文的成语、谚语、歇后语等令人头大,英语不也有类似的 idioms 和 proverbs?如今科技发达,查找字典的困难已迎刃而解了。我们甚至不必把字打出来,随手掏出手机拍个照,也能够轻易查字。

想必答案已非常明确:学习华文华语并不难;而根据以上的中英对比,我们或许会觉得两种语言的“难”与“易”不分伯仲(或甚至觉得中文比英文容易)。可见,我们口中的“难”,并不来自于语言本身,而是学习者的语言背景及学习环境。为何还有人认为中文难学呢?其原因不出以下两点:

首先,在语言学习中,文化的因素确实存在。就比如:“男”为何由“田

和“力”组成?“女”字为何那么像一个跪坐着的女子?若不懂古代社会男耕女织、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我们也许就体会不到汉字的趣味、中文的博大精深了。

又例如:姜太公为何钓鱼?“狗”为何“咬”吕洞宾?要是不理解中华文化的传说故事,这些歇后语对学习来说,恐怕只是随意凑成的几个字。所以,语言学习是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学习语言,不仅要理解它字面上的意思,更要理解其文化底蕴。

其次,社会环境对语言学习有着重大的影响——通过多接触而习得语言,才是最“无痛”的方法。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认为学习中文很痛苦,正是因为他们与其接触的时间并不多。

在国外的单语环境中,能辅助中文学习的资料难免有限。而新加坡虽提倡“双语政策”,国人对英语和华语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英语作为新加坡的主要教育与工作语言,在国人

的心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许多家长而言:“英语不好”定成千古恨,但若华语不好,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家长的想法亦是如此,我们又能如何盼望学生重视华文呢?当学生们不重视这一语言,对它的学习也就不上进、草草了事,这样又要如何把中文学好?总学不好,又不自我反思,学生便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中文难学”了。

总的来说,这世上没有任何语言是容易的,却也没有任何语言是难学的。与其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找“华文难学”的借口,我们何不把心思放在怎样学好它呢?

正如前教育部长王乙康所说:“学母语的关键不在于程度,而在于态度。”确实。若我们不试着改变自己对华文华语的态度,那它对我们而言,永远只会是“像天书一样”的文字。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学生

(原载于11月9日《联合早报》)

清晨 料峭
幽静的街道
昏黄的街灯下
一个人影在街道上慢慢移动
身穿着橙黄色的外套
手持藤条特制的大扫帚
从街头扫到街尾
清理干净街上的垃圾
每天坚持不懈的工作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清道夫

北加:孤雁

清道夫
清洁街道的工作人员
辛勤的劳作
缔造出这座城市的整洁

每天早晨流畅着的清新的空气
让市民的生活环境感到安然舒适

清道夫
你虽然是清洁工
但却是市里的标兵
你们尽心尽力服务社区
落实市容的整洁
我们应该感激你们的责任感
要为大家大力鼓掌



王祥书画作品

郊外即目

秋暖诱开春海棠,
霜枫银杏正丹黄。
柳疏还隐凫双宿,
惊起滑飞一线光。



由马西姆·林(Max Lim)当指挥的福曼斯四重奏乐团(Flimax Kwartet)唱片的其中一张。

日本占领时期
在日本占领时期,印尼的爵士乐受到重挫。日本殖民者认为爵士乐是来自他们的劲敌——美国的音乐,因此严禁在公众场合进行爵士乐表演。否则,违规的音乐家将受到严重的处罚。

然而上述禁令并不是导致印尼爵士乐中断的唯一因素。所有欧洲后裔的

爵士音乐家,不管是纯正的欧洲人还是混血儿都被迫做苦役或被关押在俘虏集中营。那些幸运逃过一劫的音乐家大多数是印尼原住民或土生华人,日本殖民者将他们视为亚洲人。他们一部分人依然从事音乐行业,但是只能演奏那些得到日本殖民者许可的音乐。另一部分人则选择放弃音乐,转行从事其他行业。

独立战争时期
在日本向盟军投降,印尼宣布独立后,印尼的爵士乐逐渐复兴。然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对于印尼的爵士乐未来发展来说影响甚大。大量的爵士乐家不是在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过程中战亡,就是被迫做苦役之后丧命。这对于印尼的爵士乐来说是极大的打击。

他们中幸存的一部分人,有的是老百姓,有的继

土生华人与爵士乐(4)

艾尔弗雷德D·迪科阿鲁(ALFRED D. TICOALU)

续当兵,都重拾音乐。但是,因为当时仍处于动荡时期,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很多早期的爵士音乐家选择了离开印尼。也依然有人选择继续留在印尼发展。其中一位土生华人选择留在印尼,他叫海因·叶(Hein Yap),是一位半职业鼓手。1948年和1949年间,他曾和暹罗摇摆(Siamese Swingers)乐队在雅加达合作演出[电话采访,尼科·西嘉拉基(Nico Sigarlaki),2003年9月22日; Moesson, 15/10/1986: 17]。

陈汉斯和马西姆·林时期
有两位土生华人爵士乐家选择去荷兰发展,他们分别是陈汉斯(Hans Tan)(Tan Tjeng Bie/陈清美)和马西姆·林[与林哈利(Harry Lim)并没有亲属关系]。

陈汉斯在巴达维亚时就开始弹奏吉他和贝斯。他与罗伯·普隆克(Rob Pronk)(钢琴家、小号手和作曲家)成为好友并和他一起演奏音乐。罗伯(Rob Pronk)是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的印尼裔混血儿,后来成为欧洲榜上有名的爵士乐家。1947年他们一同去荷兰上学。在荷兰时,陈汉斯选择的虽然是技术专业,但是仍很认真地弹奏爵士乐。他还成为了罗伯·普隆科·博普特乐团(Rob Pronk Bopet)[电话采访,罗伯·普隆克(Rob Pronk),2009年

10月10日]和恩斯特·范特·霍夫·恩·金管弦乐队(Ernts van't Hoff en Zijn Orkest)(Eyle, 1978: 40)的一员。

马西姆·林(Max Lim)(茂物,1928-)在二战前就开始学习钢琴,有时候他也拉手风琴。年轻时,他在印尼居住,视泰迪·威尔逊作为自己的偶像,后来搬到荷兰后,他的偶像就换成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了。从马西姆·林演奏的音乐中可以看出这两位偶像对他影响之深。1946年在雅加达,马西姆·林和迪克·范·德尔·卡培伦(Dick van der Capellen)(贝斯手)和古皮斯·霍夫兰德(Guus Hoolland)(吉他手)组合成布兰

顿三人组(Blanton Trio)乐队。布兰顿三人组乐队是印尼第一个举行比博普爵士乐表演的乐队。这个乐队一直忙于在雅加达进行舞台演出,多数是通过广播电台电波将音乐传送给听众(Muziek, 02/1947: 11)。因马西姆·林去荷兰学习,这个乐团于1947年解散。在荷兰期间,马西姆·林也成为了一位职业爵士乐家[电话采访,马西姆·林(Max Lim),2010年2月20日]。他所带领的其中一个乐团是福利曼斯四重奏乐团(Flimax Kwartet)。1955年,这个乐队录制了两张黑胶唱片,由奥美加(Omega)录音公司负责出版。这张唱片印证了马西姆·林是第一个发行了商业爵士乐唱片的印尼土生华人。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